

救赎现代化

by Ruth Hayhoe

救赎（redemption）是西方各种宗教的元叙事。梅瑟（Moses）的救赎故事，在东方宗教世界鲜为人知，不过仍在现代性的元叙事下融合了东方。但在西方现代性衰败的今天，我们仍可借助它来吸收不同的文明。我们醉心于现代性带来的好处，诚如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孤芳自赏之后就对其他文明的现代性进程视而不见。我们西方人是否可以作一些共同努力向非西方文明学习？是否去聆听杜维明提倡的新儒学？是否愿意用充满聆听的耳朵来感悟儒、释、道思想的博大精深？这里我将聚焦两个层面：一是比较教育的个人反思，二是对中国和日本教育现代性的思考。

比较教育与现代性的救赎

最近，韦尔奇（Anthony Welch）和柯文（Robert Cowen）都批判了后现代主义。韦尔奇认为后现代理论陷入了神秘术语的陷阱，憎恶元叙事方法。柯文也认为比较教育中的后现代主义极度狭隘，对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人们关切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

哈贝马斯关于源自工具理性主义的西方现代性的畸变特性（a jagged profile），为比较教育提供了哲学起点。他超越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提出交往行为理论，为救赎现代性找到了出路。比较教育是西方现代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比较教育学鼻祖朱利安（Marc Antoine Jullien）提出把教育研究科学化比康德的所谓“社会物理学”还要早一个多年代。科学化的取向却把价值观与美学拒之于科学王国门门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用令人心酸的“铁笼”形象，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现代科学价值观困境。我于1970年代初入比较教育领域时，社会科学正处于实证主义方法论一统天下的时代。霍姆斯（Brian Holmes）回顾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方法的发展历程。在波普尔（Karl Popper）科学哲学和杜威（John Dewey）实用主义的基础上，霍姆斯提出了比较教育的“问题法”（“problem” approach）。问题法赋予价值观以重要地位。沿着韦伯的路线，霍姆斯坚信价值观是民主社会的自由选择。科学理性在识别价值观或指导政治判断的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霍姆斯的学生们密切关注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并使用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和世界系统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分析框架去关注宗主国通过殖民或新殖民势力压迫殖民地本土文化的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运用启蒙运动树立的价值观来剖析资本主义的缺失畸形。托芮斯（Carlos Torres）在1998年的主题演讲提出的“民主、教育与多元文化主义：全球世界的公民困境”，就是在古典主义的基础上整合各种理论，如女性主义、后殖民化主义、批判种族理论等，来阐述被重新定义的公民概念。这一救赎现代性的方式开启了置身于全球的考虑，并辩论了继承了现代性遗产的个体自由，且与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全盘否定现代科学理性迥然有异。比较教育中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一个不足是，只偏执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却漠视甚至忽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加尔通（Johann Galtung）的“帝国主义结构理论”批判了上述两种现代性，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和新殖民主义关系，同样揭示了苏联帝国主义体系中的统治与压迫。

世界秩序模式项目（WOMP）拯救现代性的方法，相对于新马克思主义而言，在结构和概念上更加开放。它寻求其他文明的理念，以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共同体。来自阿拉伯、印度和东亚的声音进入了知识话语的核心地带。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一个基于启蒙运动的

现代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轰然消失了，这给新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一堆难题。无论从结构还是概念上说，这就使得世界秩序模式项目与比较教育更为休戚相关了。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激烈论战，也确实应该让位给来自其他文明背景的挑战了。

大学作为既是现代性的工具又是现代性的产物，被人们期望在新千禧年里能够促进文明间的广泛对话，以塑造人类的共同未来。西方需要理解其他文明的尚在建设之中的现代性项目，听取他们在改造西方现代性过程中所获得的智慧，并将其用于对西方文明的救赎。

把救赎与现代性两大元叙事并列探讨，当然是与我自己根深蒂固的基督教背景有关。但是，救赎这个概念也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传统所共有的。在对比较教育发展的个人反思中，在一种自反性的现代性中，我对救赎的种种可能与变异提出了我的看法。无意贬低后现代主义所开辟的学术新天地，我只是想努力揭示现代性不断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以及为未来世界提供共同探讨一致的价值观的真义与空间的元叙事的价值。

探寻亚洲的元叙事

我毕生研究中国的教育与现代性，也与日本有过稍短一些的接触。我希望以救赎和现代性元叙事的背景描述对意义的探寻如何开启了对中日两个社会的理解。与这两国老一代学者的交往，使我能够倾听和了解他们对各自国家建构现代性的历史经验。与西方现代性救赎概念相对照，我尝试把中国的现代性称为“人文化的现代性”（humanizing modernity），把日本的现代性称作“和谐化的现代性”（harmonizing modernity）。

与中国的相遇是在“文革”开始的1967年，当时我在香港得到一个教职。接下来的几年中，比较教育成为一个理论指导图，使我开始探索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努力通过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历程。多年的历史研究和在中国各地的实证调查，使我观察到中国两次现代化努力失败的悲剧。一是国民党（Nationalist Party）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被中日战争、二战和后来的内战炮火摧毁。二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文革”的冲击下化为灰烬。当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高瞻远瞩地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口号时，中国的教育家们必须探索一个在中国自身背景的现代化救赎之路。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提出，一是西方在不断重演的历史悲剧中的作用；二是从中获取什么教训去确保第三次现代化的成功。到1980年代初，中国与双边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签署了大量的合作协议，其中对于教育有特殊意义。因此，这是一个急迫的问题：新马克思主义或依附理论是否有助于反思过去的错误，以及国际援助在中国的第三次现代化过程中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吗？

在比较了国民党时期与共产党时期所受的外来影响后，我吃惊地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比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具挫伤力。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汲取西方模式的过程中大量地采用了折衷主义（eclecticism），中国教育家也以创新改革而享誉国际教育界。其中，蔡元培作为北大的著名校长，将北大打造成了思想自由与民主的捍卫者。另一位是陶行知，他把杜威实用主义的“知识—行动”概念颠倒过来，变成“行动—知识”，成为中国乡村教育进步运动的核心思想。

迥然不同的是在1950年代，苏联模式作为唯一的外国模式渗透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当然也就没有教育家的用武之地。令人惊诧的是，苏联模式割裂了理论与实践，把适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化及高度专业化的课程分类搬到了中国。大批苏联专家队伍开进中国，“帮助”新中国建立起一个史无前例的最彻头彻尾的外国模式。这种线性、机械的模式，是一个巨大的、多层次的科层制度结构。马列主义变成控制每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教条，而不是一种

灵活的、为批判反思和激进行动的解放工具。这种粗陋、畸变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导致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爆发出混乱和暴力的、社会文化层面的矛盾性。

多年以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关于现代化的观点，也是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所共有的观念，即儒家思想必须被彻底打倒，然后中国才有望实现现代化。然而，当我在一个叙事研究项目中与七位领军教育学者长谈中国有影响力的教育家的生活故事时，却听到了截然不同的故事。他们都告诉我，他们从家庭教育和早期教育中学到的儒家思想，是道德力量的源泉，使得他们能够忍受从抗战到文革的种种巨大的悲剧，并积极响应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提出的关于现代化的号召。摒弃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模式，他们在展望对中国未来发展时都希望坚持一条自己的道路，并把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置于这一信念的核心。七位教育家中最年长的李秉德先生认为，儒家思想的特质在于兼收并蓄、无所不包的多元性。它的核心思想是“吾日三省吾身”，反省自身的修养及人生的方向。有了这种（儒家）思想恢复的基础及同时尽可能地吸取了大量的外界经验，他坚信中国最终会在第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中获得成功，将能够赋予现代化以人文化（humanize modernity）。七位学者中最年轻的鲁洁，也颇具远见卓识。她的父亲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杜威的门徒。她自幼就受到独立思考和个体人权的熏陶，现在正在南京师大从事教育学的中国本土化。她相信中国文化可以为世界贡献良多。如同杜维明在海外华人中创立“孔子项目”一样，她坚信中国文化可以为全球的发展提供富于意义的道德方向。在喧闹的二十世纪，儒家思想支撑了中国教育家的价值观，变成一种元叙事。我坚信在新千禧年里它将会对教育领域的全球对话作出巨大贡献。

简单谈谈日本。我对日本的了解少得多。我认为，日本有过两次主要的现代化过程，第一次被1945年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所摧毁；第二次始于二战后，日本开始致力于和平发展。如幅尾辉久和爱德华·比彻姆所述，五十年代以来在教育政策上的不屈奋争可看作是一种救赎的过程。日本的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为何会如此糟糕地误入歧途，最终在四十年代给整个东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考虑外来的帝国主义模式的影响的同时，也须看到来自日本自身的选择与决策。日本虽然在近代史上从未被西方霸权所殖民化，但是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曾大力学习欧洲模式。新渡户稻造是一位基督徒，在二十世纪早期用大量的时间在美国讲学。他详尽地讨论了日本的两个殖民地——韩国与台湾，描述了日本帝国比欧洲更开明、更有效地进行殖民。他的口吻带有一种隐约的自豪感和不容置疑的假设，即获得殖民地是现代化进程的必不可少的内容。西田几多郎和柳田国男接受了一些欧洲的启蒙思想，即指向高级文化形式的社会进化观。无意之中，两位学者为日本军国主义拥趸提供了衍生自西方的文化工具——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军国主义借此将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合法化，并不惜一切残忍的手段侵略其邻国，企图成为“亚洲的西方帝国主义”。

这里我想点明的是，日本正是在第一次现代化历程中经历了哈贝马斯所指称的现代性的畸变特性，不过却是以非常粗暴乃至冲突的方式——那就是用工具理性的理由来主宰、以麻痹对生命世界的道德与审美的理解、乃至以失败而告终。二战战败后是什么因素使得日本的现代性发展不再构成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威胁，而是成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广泛研究的一个模式呢？或者用元叙事方式来讲，它是如何拯救现代性的呢？日本多元的本土文化——并非所谓的抽象的西方社会科学——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来源。太田尧教授把启蒙运动描述为男性文明，以机械的、线性的理性为特征。它对现代化成就的取得当然至关重要，不过它又需要通过感觉与情感而被软化和雕凿，从而变得圆润。这种相互的人文关怀和关联（係り合）的智慧，可以缓冲和转换这些机械性的知识范式。这种智慧主要源自直觉和潜意识，正如佛教的禅。

结论：元叙事的赞歌

源于犹太—基督教价值观的救赎现代性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元叙事方法。它开辟了新天地，让人能够聆听来自其他文明传统的元叙事，特别是源于儒家和佛教思想的中国和日本的声音。因此，我提议应当思考如何去重新塑造曾让每个人都饱受影响的现代性——这需要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用一种可以跨越不同文明的共享元叙事的方式。对一个或者多个元叙事价值观与伦理目的的深入了解，将会正如为后现代主义所[高擎](#)的不同与异变庆贺那样有效地为其它文明的现代性元叙事开启空间。